

李欧梵 著

清水湾畔 的臆语

QING SHUI WAN PAN DE YI YU

本书是李欧梵先生近一两年内的文化随笔集，内容从非典时期的人文反思到对香港文化的种种思考，从当代文化名人的评论和回忆到音乐、电影和书籍的欣赏品评，均有涉猎。先生以学者的一双“热眼”察人观世，用温婉的文笔针砭时事，思想深沉，给人新鲜的启发，是一部严肃学者谈论世俗文化的好作品。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李欧梵 著

清水湾畔 的臆语

QING SHUI WAN PAN DE YI YU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水湾畔的臆语/李欧梵著.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5

(时代思想与艺术丛书.第3辑)

ISBN7-5633-5316-X

I. 清… II. 李…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024774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育才路15号 邮政编码:541004)
网址:<http://www.bbtpress.cn>

出版人:肖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90mm×1240mm 1/32

印张:8.5 字数:157千字

2005年5月第1版 2005年5月第1次印刷

定价:19.80元

如果发现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第一部 活在瘟疫蔓延的香港：重读经典

活在瘟疫蔓延的香港	3
从 SARS 看香港社会的文化意识	7
非典退潮时的综合反思	20
人文人生	24
我要贩卖文学经典	
——后 SARS 时期的人文反思	28
瘟疫与人生	
——文学再反思	32
对牛弹琴	
——卡缪《瘟疫》的启示	36
文学解药？	
——在香港重读卡缪的《瘟疫》	40
瘟疫与自由	49
重读卡夫卡札记	53
香港课室的卡夫卡	58

在香港教卡夫卡	60
《海边的卡夫卡》与人文人生	64
谁还怕维琴妮亚·吴尔芙?	68
重读《卡拉玛佐夫兄弟》	70
《乌托邦之岸》	72
我看哈维尔	
——一个“伟大的人文心灵”的命运	76

第二部 清水湾畔的臆语

清水湾畔的臆语	
——大学与书店	85
商品化后的经典	89
《蛋白质女孩》,然后呢?	93
云门三十年	
——向林怀民致敬	97
交响乐团的另一种旋律	101
香港管弦乐团奏出新音符	105
三位华人杰出音乐家	
——李云迪、朗朗和林昭亮	109
澳门音乐节是审美旅程	113
澳门听“水乐”欣赏谭盾	117
和阿当诺唱反调	1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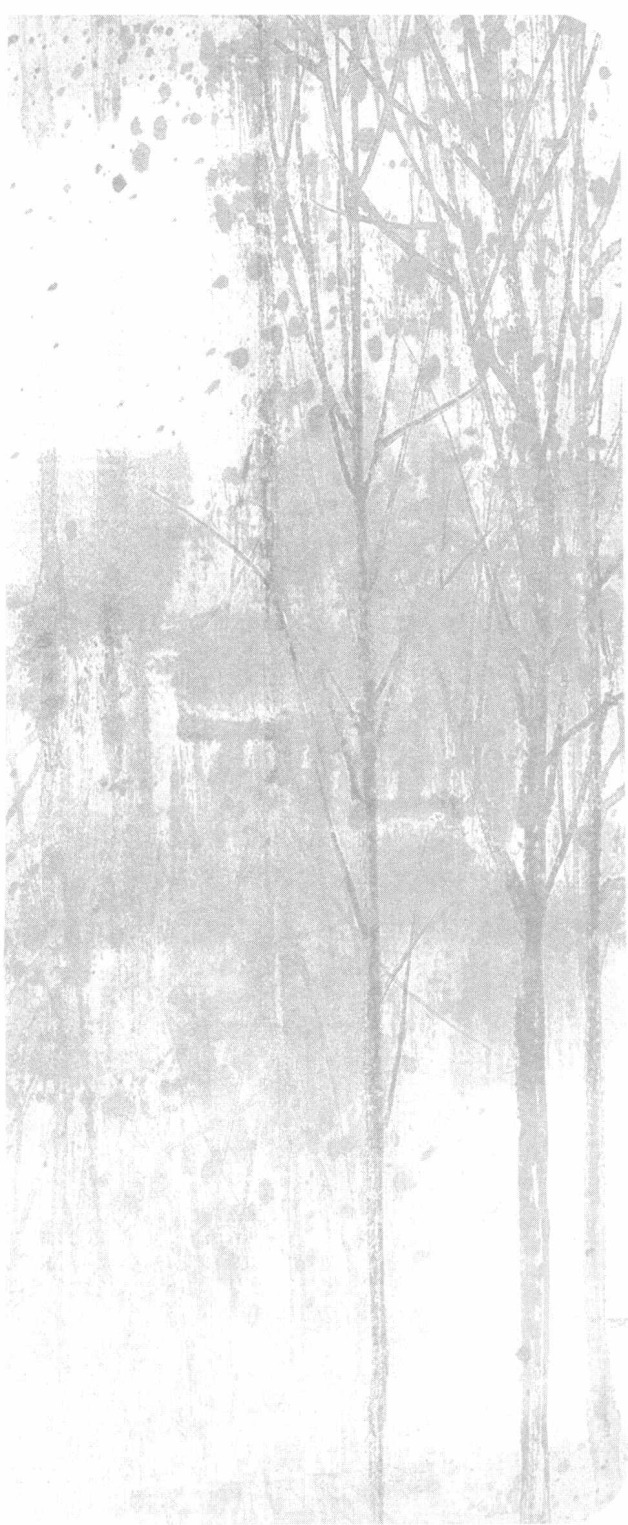
《英雄》如何是英雄?	124
台北·香港·上海·文化旧梦	128
中国城市现代化的悖论	132
纪念萨依德	136
悼念现代文学大师施蛰存	142
百岁巴金在想什么	146
都市建筑的开创	
——从“新天地”到西九龙	150
历史的幽魂	154
香港回归五周年有感	156
“全城热话”	
——黄昏之恋	160
《小孩不笨》，新加坡人也不该笨	164
《上海老歌名典》和《乐乐集》	167
过度管理	
——香港大学教育的危机	169
小众的力量	173
二十一世纪的文艺复兴者	175
“想像共同体”的版图	178
翻译名著的流传故事	182
《切身经验》	184
吴宇森的英雄	
——梅维尔	186

第三部 浮生札记:附录与补遗

忆金铨	191
韩南教授的治学与为人	203
从芝加哥到香港	
——一段心路历程	211
当代华文写作的语言问题	215
漫谈李晨风的三部影片	222
人间四月“残酷”天	
——重读《爱眉小札》	229
重读《浮生六记》	241
《世故与天真》序	251
三生事,费思量	254

第一部

活在瘟疫蔓延的香港：重读经典



活在瘟疫蔓延的香港

英籍美国诗人艾略特(T. S. Eliot)诗中的名言——“四月是最残酷的月份”竟然在香港再次应验。“非典型肺炎”(亦称“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症”)逐渐侵蚀到各个社区,每天感染的人数不断,全城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即使没有宣布为疫区,香港人已经以此自况,在心理上自我封闭,甚至还互相攻讦:淘大花园被迫迁移的居民抱怨政府;附近的居民埋怨淘大居民;其他社区谈虎色变,避之犹恐不及,人人自危。四月还没有完,人心的残酷和冷漠已经暴露无遗!

从外地人看来,香港也变成了一个“围城”:困在里面的人出不来,而外面人当然更不想进去。为了打破这个局面,我特别在四月初趁开会之便和妻子到京都小游几天,看看满城灿烂多姿的樱花,心情为之一爽。日本的朋友说:“多住几天吧,趁着这个机会散散心,不要回香港!”也有朋友说:“反正学校停课,干脆你返回美国算了!”然而我的感觉却恰好相反,迫不及待地要赶回香港。为什么?自己也说不清:

也许香港愈来愈像我的家,在此危急时刻,难道我应该离乡背井做个逃兵?

然而看到香港各种媒体的报道,又使我对这个家园感到气馁:香港人除了互相攻讦之外,怎么看不到太多的互助精神?不错,在医院前线日夜奋斗的医师和护士收到不少谢卡,但这些安慰还是远水救不了近火。为什么私家医生和护士没有组成自愿队伍去协助?我一直认为香港的社会服务精神和组织并不逊于其他城市,然而在瘟疫蔓延的时刻似乎也束手无策。而政府的各种宣言口号(处处不离“信心”)更显得有气无力,行动和计划上的识见和魄力好像也无法和台湾地区与中国内地相比。长此以往,怎么办?

我不是医生和科学家,最多也只能做个“心灵上的工程师”——这句斯大林的“名言”,我一向嗤之以鼻,现在反而成了我反省的工具之一。我能够为香港做些什么?也许只能为香港人近年来低迷、困惑、自怨的心灵提供一点“解药”?但是我又不能保证这个药方有任何灵验之效。

我对自己下的解药就是文学。先到图书馆借几本描写瘟疫或与疾病有关的小说来读,才发现中国古典和现代文学中以瘟疫为题材的极少(在此也向各位同行高手请教),而西洋文学作品却俯拾皆是。就以二十世纪经典小说为例,至少就有汤玛斯·曼(Thomas Mann)的《威尼斯之死》(*Death in Venice*)、卡缪(Albert Camus)的《瘟疫》(*The Plague*)和马奎斯(Garcia Marquez)的《爱在瘟疫蔓延时》(*Love in the Time of Cholera*),我正在重新阅读中。这次的体验较前不同了,

我发现这几部作品都有股强烈的文化气息和精神层次,瘟疫不过是表面上的象征。以后在适当场合再详细讨论。

香港的媒体报道,恰好就缺乏了这种文化和精神上的深度;大都是浮面的数字、个案、访问、批判、谩骂充斥,却没有记者像卡缪一样,把一个城市的瘟疫详详细细地写成一本“精神史”——非洲的这个小城奥兰(Oran),在他笔下因此得以不朽。而《瘟疫》这本小说是以一种报道文学的方式写出,叙事者的医生,在最后才自认身份。《瘟疫》把人心的好恶、人情的冷暖和人的存在价值都写出来了。读后我才发觉:原来卡缪不只是个存在主义的哲学家,以为人生是荒谬的,他更是一个以人为本主义者;《瘟疫》对我的启示是:人的存在如果没有内省、勇气和行动,那才是毫无意义和价值。

此时此刻,香港“围城”的存在,也为香港人的存在提供一个价值上的坐标和契机。外国人一向只把香港作为一个游客购物的商场,最多也只能像汤玛斯·曼笔下的威尼斯一样:“那个有撩人之美但又不可靠的城市,一半像童话,一半是游客的陷阱。”但是作者接着又说:“这个城市有病,而且由于贪婪而故意保密。”所以不要霍乱疫病让游客知道。至少香港政府没有保密!然而,它是否会像汤玛斯·曼小说中的威尼斯一样,“充满了衰亡的污气”?

听说这次非典型肺炎的源头是中国内地,但偏偏世界卫生组织把这个“非典型”的疫病名称(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SARS)和香港的官方英文缩写(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SAR)混为一谈,于是香港政府不安了,想要

“正名”，其实又何必？难道看不到更深层的寓意吗？在全球化影响下，其他地方也早已成了香港了（所以用多数的SARS）。

也许我们应该把瘟疫视作一种警告：当现代科技自傲为万能的时候，古老的文明会从地底发出一句冤言：几个世纪的进步和发展又把我们的文明改变成什么样子了？为了面对个人对人类前途的悲观，我觉得更要学习卡缪的勇气——不是愚人之勇或空泛的自信，而是在灾难中反思后的存在勇气。在这个全球一体的困境中，香港反而成了危机急先锋，一个城市人的精神面貌，特别是在这个危机的情境，恰可作为其他城市的镜子。

我希望香港人不要妄自菲薄，反而应该要比“九一一”事件后的纽约客表现得更好。

二〇〇三年四月

从 SARS 看香港社会的文化意识

—

“非典型肺炎”的英文代号 SARS 刚好和香港的官方英文名称 SAR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偶合, 遂使人不知不觉之间把香港的疫情视为“典型”: 从西方的“东方主义”立场看来, 香港又成了东方的罪恶代表。虽然非典型肺炎的源头是广东(但广东官方至今仍否认), 但外国人当然一口咬定是从香港传来的, 因为香港一向是中西交通的枢纽, 所以连传染菌的流动性也是首屈一指。如果用《纽约客》(*The New Yorker*) 杂志的一贯笔法来描写这次 SARS 事件, 可能会这样开头:

在九龙闹区的京华酒店九楼, 一个发高烧的老教授——他来自广州中山大学, 也是一个医生——走进电梯, 一不小心吐了一口痰, 同在电梯中的还有数名房客, 数天之后, 就从这一个中心 (epicenter)

掀起另一场全球性的地震！那几个同进电梯的旅客中，有人次日到了新加坡，也有一个本地年轻人，不久也发了高烧，经辗转介绍到了沙田的威尔斯医院应诊，但医院中的医师忙碌万分——这和香港任何机构的生活节奏一样，甚至犹有过之——遂掉以轻心，把这个病例作普通感冒情况处理。不料数日后，几位医护人员连续中招……于是一场灾难悄悄地席卷这个当年的东方明珠。

诚然，香港自从一九九七年回归中国之后，各方面都在逐渐衰落，这一次的 SARS 袭击，可谓对这个几乎同名的 SAR 特区给予最后一击……

如果用这种“叙述新闻”或“非小说”的方式写下去（可能已经有人已经动笔了），一定会情节紧凑，撼人心弦。然而我不是《纽约客》的记者，当然不会如此分析香港的疫情。我毕竟已经成了半个香港人，我的叙事观点已经受到本地华人社会的限制；或者说，我不愿用一个外来人有距离的“全知观点”来看待此次经验。这几个月来，我和妻子就住在香港，和港人共同生活，共同呼吸，甚至在居所乘电梯时也不忘戴口罩，这种感受，不是一个外地记者可以写出来的。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来，我还是一个旁观者。自己没有染病，也没有接近险区——如淘大花园——所以个人的观察仍然不如一个“目击者”具体，而且我每日阅读的大多是华人报纸，以《明报》和《信报》为主，并不常看更接近群众的

主流媒体如《苹果日报》和《东方日报》。香港的英文媒体中,除了电视无线英文台外,至今仍是《南华早报》一枝独秀,这家报纸年前有认同危机,似乎不愿以香港为其主要视界,甚至想重新定位在“南华”,以求名实相符,因此我反而不愿意看它,然而此次 SARS 又把它拉回到“本土”来了。值得一提的是:香港的西人(包括印度人、菲律宾人、尼泊尔人等少数族群),此次捐款救灾,十分踊跃,可能就是响应《南华早报》发起的“护盾”(project shield)运动,筹款为医务人员添置装备,几日内捐款已近千万港元。据该报评述,这些少数族群和宗教团体,都是认同香港,并以香港为家。华文报纸反而忽视了这个少数族群的存在,这也证明了我的看法:香港的华人社会存有不少盲点,盲点之一就是文化视野不够多元。

本文的观点虽然力求多元,但仍不免受到我所读到和看到的华文媒体的限制,在此必须向新加坡和其他地区的华文读者交代。

二

我认为目前的香港社会结构,非但有华人和西人之分,也有政府和社区之分,此次 SARS 肆虐的两个多月疫情,也把政府和民间的分歧推至极点,而最终是政府在民间各种压力之下重新振作,导致某种程度上的凝聚。

“非典型肺炎”二〇〇二年底在广东发生时,香港政府和

民间皆不在意,甚至对于广州市民竞买白醋挡灾之说,嗤之以鼻。今年年初,两地皆因春节喜庆而不顾其他,到了三月中情况开始严重,政府方面已经乱了手脚,决策和行动都较新加坡和台湾地区慢了几拍,我想原因之一就是香港政府的官僚组织中的“程序心态”:这是英国殖民主义的主要遗产,一切都需要固定程序(due process),程序必须经过公文,而香港公文的内容和形式(包括语言)皆甚繁琐。当然,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早已在其著名理论中指出:这是所有现代化或合理化(rationalization)所必备的条件,香港可谓将之推展到极致。也有人认为:这也是民主制度往往较集权制度在行动上慢几拍的原因,民主必须议事在先,咨询讨论更费时,最后决定时又往往意见分歧,到了紧要关头怎么办?

我们不妨把纽约“九一一”后的救灾行动和香港作个比较。纽约的市政府也是一个官僚机构,而当年的市长朱利安尼(Rudolph W. Giuliani)刚闹婚变又有癌症,正倦倦欲退,但“九一一”事变却令他奋然而起,发挥领导的才能。在这个非常时期,领导人物的魄力和“魅力”(charisma)至关重要:从古巴危机时的肯尼迪总统到“九一一”后的朱利安尼市长都有足够的才智扮演这一个角色。但相形之下,香港长官恰好相反,非但没有媒体魅力,而且在办事上受制于香港典型的“固有程序”,其属下的主要官员更是如此这般办事,甚至在语言上都无法招架媒体的攻击。香港官僚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市民投诉必须响应,响应多了反而养成一个“响应”的被动心态,不能实时采取主动。甚至当商业电台